



《歧路灯》“官场”描写述论

杜贵晨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济南 250014)

摘要: 李绿园《歧路灯》以写“教子”为中心, 旁及官场, 写了个别的贪官和大量的“好官”; 其托明代以写清中叶, 揭发指斥官场的时弊已至不可救药的地步, 却指望着政治清明, 多一些人入官场后能洁身自好, 并前无古人地在书中传授暗黑世纪里做官的经验。但结果是, 这部小说并没有给人以改良政治的信心, 小说家创作“名臣传”干政救世, 遭遇了古罗马历史学家所谓的“塔西佗陷阱”, 因而小说虽写了那么多的“好官”, 却从来未能引起读者的注意。

关键词: 李绿园; 《歧路灯》; 官场; “名臣传”; “塔西佗陷阱”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9)12-0637-09

On the description of "officialdom" in *Qilu Deng*

DU Guiche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Li Luyuan's *Qilu Deng* centers on the writing of "teaching children" besides officialdom, and depicts individual corrupt officials and a large number of "good officials". Pretending to write in the Ming Dynasty, he actually wrote the middle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denounced the corruption of officialdom. Despite the corruption of the government, he expected political clarity. Many people could preserve their moral integrity after entering official circles and pass on their experience of being an official in the dark century. But the result is that the book does not give people the confidence to improve politics. The novelist's mind of participating in politics and saving the world in "the biography of famous courtiers" met the so-called "Tacitus trap" of ancient Roman historians. Thus, there are so many "good officials" in *Qilu Deng*, but they have never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readers.

Key words: Li Luyuan; *Qilu Deng*; officialdom; "the biography of famous courtiers"; "Tacitus trap"

人类自从出现了国家, 官场就成为社会的中心之一, 同时也成为文学描写、尤其是小说叙事的中心或中心之一, 突出体现于多数甚至大多数小说作品的故事, 即使不是发生于官场, 也很少不与官场有联系, 或者最后经官得以解决。例如才子佳人小说, 本是个人的私事, 但往往也要惊动天子, 落入“才子落难中状元, 奉旨成婚大团圆”的结局的俗套, 就是典型的证明。这种情况, 在本以写“教子”为中心的长篇教育小说《歧路灯》中也是如此^[1]。《歧路灯》^[2]的作者李绿园是举人, 又做过知县, 熟悉并热切关注官

场, 因而《歧路灯》于写“教子”为中心的同时, 涉及官场的容量大而突出, 揭露官场黑暗的描写广泛而深刻, 成为本书的显著特色, 堪称一部托于明代实写清中叶的一部“官场现形记”, 对于“《歧路灯》艺术的研究必与其思想价值的鉴定同行”^[3]。因此, 此内容有值得述论的价值。

一、一部“名臣传”

笔者在他文已论, 《歧路灯》“以大量的篇幅, 精心刻画和高调歌颂了清官良吏的‘爱民’行为, 在中

收稿日期: 2019-03-03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9-16

作者简介: 杜贵晨(1950—), 男, 山东宁阳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方面的研究。

国古代小说史上首创成功地塑造了‘爱民主义’官员的形象”^[4]。写官场既是《歧路灯》不可回避的内容，也是作者于作品主题有所注重的一个方面。第一七回写道：“谭绍衣做了河南巡抚，这些善政，作者要铺张扬厉起来，不仅累幅难尽，抑且是名臣传，不是家政谱了。”^{[2]998}固然强调了《歧路灯》重写家政，而无意多写“名臣”，但是作者就此打住似的表态，实以证明作者自觉书中写“名臣”已多——尽管写的是一部“家政谱”，而不是“名臣传”，但是不知不觉间写得近乎一部“名臣传”了。这就似乎无意中暗示读者，《歧路灯》在“教子”书、“家政谱”的双重主题之下，尚有“名臣传”的层面，也是不可忽略的。

《歧路灯》写现任官，唯一有贪腐行为的是祥符县令董守廉。他原是县衙的一个主簿，“裤带拴银柜——原是钱上取齐的官”（第五十一回），虽一路贪污，却因县令程公升迁而“带病提拔”升转县令，但不久即“因贪被参。现在闲住候审”（第五十四回），后来就没有了下文。所以《歧路灯》写这个人物，固然有一揭官场贪腐的作用，但其目的并不仅限于此，还在于给谭绍闻一个通过夏鼎行贿邓三变，向董知县说情脱罪的机会，为谭绍闻败子回头留一线生机。因此，《歧路灯》仅仅写了一个贪官，而且这个贪官还被参候审了，其他几乎都是清官、好官，如荆公、边公、娄公、程公、周学正、谭绍衣、季刺史、等等，又上至抚台，下至县令，均升迁顺利。其写“好官”如此之多又大，且官运亨通，在古代长篇小说中是仅见的。

但是，《歧路灯》一面写好官多、贪官少，好官大、贪官小；另一面却又借书中人物之口怒问：“即如今日做官的，动说某处是美缺，某处是丑缺，某处是明缺，某处是暗缺；不说冲、繁、疲、难，单讲美、丑、明、暗。一心是钱，天下还得有个好官么？”（第一五回）好像自相矛盾，其实不然。《歧路灯》写“好官”多而大，是作者的理想；写贪官小而少，既是作者对现实的妥协，也是因为“教子”主题的限制。试想有贪官，就必有冤案；有冤案，就应有昭雪，故事就偏向公案一路去了，如何又能够是“家政谱”？而显然是“好官”的形象与“教子”——“家政”更易于兼容，也顺便写出了一部“名臣传”，实际是作者的“好官梦”。

《歧路灯》写“好官”，大致有以下特点：

其一，“爱民”第一，不亏民户。《歧路灯》写“好官”，最重“爱民”的品质。全书中用“爱民”有三回四次，用“为民”有六回六次，是古代小说中最多或最多

者之一。而且多用于表彰官员的品德，如第四十六回写孔慧娘说“丈夫事业”首先是“立朝报国，居官爱民”，把“爱民”作为“居官”的唯一要求。第九十一回写“谭观察拿匪类曲全生灵”，担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烧毁了缴获的白猿教名册，“数十家性命，赖此全矣”。第九十四回又写谭绍衣是“实心爱民的官”，受上司之命“确勘灾情”，“次日即便就道”。同回写季刺史在大灾之年为赈济百姓，担着官位乃至性命的干系开仓放粮。第一七回写谭绍衣莅任，“所过村庄，俱有盒酒迎接，六十、七十老头儿，扶杖叩头，有跪下爬不起来的。总为大人做道员时，驿上草料豆子，公买公卖，分毫不亏累民户；漕粮易得交纳，只要晒干拣净，石斗升合不曾浮收；衙役书办犯了一个赃钱，立刻处死”。第五十六回写边公正在审理案件，忽闻有火灾，即刻停审赶去救火，回未诗中赞道：“做官须用读书人，端的正心只爱民”，把“爱民”作为做官最重要的品质。而“好官”必须是百姓说好，如上述诸例，又如第三十九回写“程嵩淑擎酒评知己”，说娄潜斋任馆陶县令：

这潜老才是正经理学。你听他说话，都是布帛菽粟之言，你到他家满院都是些饮食教诲之气，所以他弟兄们一刻也离不得，子侄皆恂恂有规矩。自己中了进士，儿子也发了，父子两个有一点俗气否？即如昨日我的东邻从河间府来，路过馆陶，我问他到馆陶衙门不曾？他说：‘与娄潜斋素无相交，惹做官的厌恶，如何好往他衙门里去？’因问潜斋政声何如，敝邻居说：‘满馆陶境内个个都是念佛的，连孩子、老婆都是说青天老爷。’无论咱知交们有光彩，也是咱合祥符一个大端人。二公试想，咱们相处二十多年，潜老有一句理学话不曾？他做的事儿，有一宗不理学么？^{2]359}

这无非是说“理学”不是拿来说的，而是要亲身做的；做官的讲理学，就是要不说空话，多干实事，用自己行政的担当与作为，使老百姓获得切实的好处，而非不做实事，自吹自擂，甚至名为“父母官”（县令），却“吃儿女的肉，喝儿女的血”，搜刮残害良民，却还自诩养活了百姓，是百姓的大恩人。

其二，“勤政”为民，实心做事。既做官，就要做官事，不推，不拖，不糊弄，善始善终，自古是官员勤政为民的本分。所以儒家相传，上古先王旰食宵衣，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是官员勤政美德的榜样。《歧路灯》有鉴于此，认为勤政为民是“好官”突出的特征。如第三十一回写祥符县令

程公及时审理案件：

话说荆县尊为人，存心慈祥，办事明敏，真正是一个民之父母。尝对幕友说：“我做这个冲繁疲难之缺，也毫无善处，只是爱惜民命，扶持人伦。一切官司也未必能听断的如法，但只要紧办速结，一者怕奸人调唆，变了初词；二者怕黠役需索，骗了愚氓；三者怕穷民守候，误了农务。”所以荆公堂上的官司，早到早问，晚到晚审，百姓喜的极了，称道说“荆八坐老爷”——是说有了官司，到了就问，问了就退，再到再问，一天足坐七八回大堂。所以称道是个“荆八坐”。^{[2]287}

如此频繁坐堂，他自己的生活会被打乱，成“一沐三握发”的样子了。又，第六十回写后任祥符县令边公：

边公是勤政官员，黎明即起，正在签押房盥漱吃点心，怕词证守候，将王少湖叫进去。王少湖跪下，把貂鼠皮在夏家所为之事，一一禀明。边公见事关风化，即刻坐了二堂，着头役将貂鼠皮叫到公案，讯问起来。^{[2]561}

这里写“吃点心”的同时处理案件，就似“周公吐哺”的影子了。又，第九十四回“季刺史午夜筹荒政”写州民对谭观察称赞季刺史，道：“像今日俺们这位太爷，才实实在在是个好官。”而谭观察坚持不住公馆，不食盛筵，辞却迎送等，也真正是一位“实心爱民的官”。

其三，“秉公”执法，明察处事。第九十三回写府试童生，知府意欲宽纵一枪手，请示学台定夺：

学台道：“老先生意欲网开一面，以存忠厚之意，这却使不得。向来搜检夹带，每每从宽。因其急于功名，以身试险，情尚可宥，遂以诬带字纸，照例挟出为词，是亦未尝不存忠厚也。至于枪手，则断不能容的，拔一侥幸，则屈一寒酸，此损校士之责尤大。即如各州县详革一诸生，虽因其罪名而黜，此心犹有怜惜之意。若场屋中屈一寒酸，是这个秀才毫无过失，暗地里被了黜革，此心何忍？况这些枪手们，即令果是科目中人，也成了斯文的蠹贼，自宜按律究办，以儆效尤。”知府遂即告辞回署，遵学台之命而行，不必细述。人称卢学台秉公校士，果不负学使之使。^{[2]874}

为了“秉公”，有时须刻意避嫌。第九十二回写谭道台观风，谭绍闻、谭箕初父子并试，谭绍衣亲自阅卷：

谭道台五鼓起来，洗了脸，漱了口，吃了茶，

正要检阅公牒，商量案件，无奈这些入莲幕的，此时正是居西席位、住东君房，卧北窗床、做南柯梦的时候。只得将两束生童观风卷子，搦管濡墨，看将起来。这十行俱下的眼睛，看那一览无余的诗文。诸生卷子，节取了三本；童生卷子，看那笔气好、字画端正的，也取了三本。诸生是张正心、吴彦翘、苏省躬，童生是葛振声、谭绍闻、谭箕初。想道：“衡文原是秉公，但一时取本族两个人，未免有一点子瓜李影儿。究之观风高取，毫无益于功名，却添出一层唇舌，只得把绍闻删却罢。”^{[2]861}

其四，注重风教，保护文献。前者如第四十一回“韩节妇全操殉母”写韩节妇，其实也是写程嵩淑等人仗义和县令程公的政教，即一者由官府市买上等棺木安葬；二者县令亲自率领“两学、丞簿、典史”，“至日同往致祭”；三者韩节妇街巷改名“天香巷”；四者集合学生员求皇上表彰。此事虽迂而无当，但当时正是地方官员行一方教化的责任；后者如第九十六回“盛希侨开楼发藏板”，写谭观察（绍衣）“想起绍闻所说盛宅有一楼藏板，这留心文献，正是守土者之责，即命梅克仁发出年家眷侍生帖两个，次日请盛宅二位少爷到署问话”，许以个人出资襄助，随后盛希侨就收到观察的拜匣，“只见匣内一封，上边红签写着‘刷印书资银三十两。’”

其五，“做官只留下自己人品”。第七十一回“济宁州财心亲师范”写谭绍闻去娄潜斋衙门“抽丰”，资深幕友荀药阶当谭绍闻面对娄朴道：

弟在山左作幕已久，初到济南府，口尚无须，今已成苍然叟矣。官场所经甚多，见那营钻刺、走声气者，原有一两个爬上去的；而究之取厌于上台，见嗤于同寅，因而挫败的也就不少。有一等中正淳朴，实心为民的官，因为不能奉承上司，原有几个吃亏的；内中也极有为上司所默重，升转擢迁的。即如令尊老先生，何尝晓得通声气、走门路？一般也会升转。……做官只留下自己人品，即令十年不擢何妨？后来晚生下辈，会说清白吏子孙，到人前气长些。若丧了自己的人品，即令一岁九迁，到卸却纱帽上床睡时，只觉心中不安；子孙后来气短。不见章惇为相，子孙不敢认他是祖宗，这是何苦的呢？^{[2]683}

这一番话就做官的前途谈为官之道，一是靠钻营升官者，后来往往挫败；二是好官有的吃亏，但也未必不能升迁；但做好官，不计升迁，“留下自己人品”才是最大的价值。其说虽于官场升迁调转的实

际可能太乐观了些,也与书中写老民所说郑州“自来好官不到头”有所矛盾。然而正常情况下一般也就如此,也应该如此。这番话对于自古及今正在做官和将要做官的人,树立做“居官爱民”的信念,的确是金玉良言。

二、“官场”的写实

作为一部“名臣传”,《歧路灯》在大量描写“好官”的同时,也对官场生态有全面深刻的关注。书中“官场”一词出现在十九回中多达二十九次。这对于一部“教子”书而“家政谱”,进而一部“名臣传”来说,无疑展示了《歧路灯》描写关注官场全局的态度。

其实,《歧路灯》写官场是其题材内容上必然的外延。因为一方面《歧路灯》以“教子”为中心,写谭绍闻的堕落,涉嫖涉赌,甚至牵连命案,有许多必经官府才能推进解决的事件;另一方面作者有做过知县的经验,熟谙官场情形。从而既由于必须,也因为偏好,书中就在大量描写官员形象的同时,写及官场生态。《歧路灯》既有上所论及的“好官”(第九十四回等四回七次)梦,又成为一幅写“教子”“家政”“名臣”等多层次主题背景的“官场”图。其时隐时现,疏密相乘,浓淡相间的描写,堪称李绿园笔下乾隆一朝地方吏治的写生画与现形记,事实上构成《歧路灯》主题的又一个层面。

《歧路灯》写官场,最大的特点就是官员贪腐。虽然书中直接写到的贪官只有由祥符县主簿升任县令的董守廉,但第四十六回写这位名实相悖的董公,还在主簿这个佐贰之职,偶然有“代拆代行,替堂翁批批签押,比比银粮”的机会,就收了赌棍张绳祖的礼盒和答应事成后回扣一百两银子的贿赂,准备开庭后为张绳祖向谭绍闻讨要实际是赌债的借款。书中写董守廉心内动了欲火,连声道:

这还了得!这还了得!只叫令表侄,等我进堂上衙门去,补个字儿就是。这还了得!^{[2]428}

不料正堂程公突然回衙,他们这一笔幕后交易才没有办成。但至第五十一回写谭绍闻又被牵入窦又桂赌博致死的命案,这位“裤带拴银柜——原是钱上取齐的官”(第五十一回)又因为收了谭绍闻通过退职的驿丞邓三变所送的厚礼,竟然硬是把同一个谭绍闻又做成与窦又桂的命案无关系的了(第五十二回)。他枉法断案袒护谭绍闻的做法,竟是大庭广众之下明目张胆地不许同案犯供出有谭绍闻涉案的情节:

次日坐堂审问官司,……董公即问二人,巴

庚念谭绍闻是姑娘的新女婿,不肯供出。这钱可仰因与谭绍闻送过信,毫未照应,心中气忿,也顾不得亲戚,便供道:“当初原是谭绍闻。”董公猛然想起邓三变送礼情节,喝道:“打嘴!”打了十个耳刮子,钱可仰就不敢再说了。^{[2]489}

此后接写董守廉如何“草草结案”,整个过程与《红楼梦》中“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之“乱判”事虽有异,而徇私枉法则同。而其中诀窍,夏逢若向谭绍闻揭晓,“不过四五百两银子,竟把一个塌天人命事,弄得毫不沾身。”(第五十三回)真是“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而“衙门里有钱弄,俗话说:‘一日做官,强似为民万载。’”连谭宅的小厮也奉为信条。唯是《红楼梦》中贾雨村,毕竟挨到结束第一百十七回因贪被拿问了,而《歧路灯》中的这位董公在此番乱判之后不久,至第五十四回就“因贪被参,现在闲住候审”,料其下场一定不妙。

除此之外,《歧路灯》侧面写到的有一位官匪一家的官,是从劫匪口中说出来的。第七十三回写谭绍闻去济宁州娄潜斋任上“抽丰”载银而归,路遇劫匪,谭绍闻骑马脱逃,仆人德喜却被劫匪魔王捉住要杀,另一位劫匪谢豹连忙劝阻。劝阻的理由是抢劫地所属县的县令“沈老爷”平时纵容这些劫匪胡作非为,不严加追捕,即便捉到,也是敷衍轻责;县里刑事捕头与劫匪是结拜兄弟,还有人情礼节往来。此县属地是劫匪们的紧急避难所,如果出了人命案,劫匪和县令县吏无法见面相谈言欢:

设若要丢下个小人命儿,他身上有这宗批,咱身上有这宗案,如何好厮见哩?你再想。^{[2]702}

这位“沈老爷”虽然未在书中直接露面,但是劫匪谢豹这一番亲切的介绍,已经描画出其长年通匪和地方上官匪一家的世情:这位沈某的辖下简直就是这伙江湖劫盗的大后方。而这样的地方和如沈某一样与劫盗共舞的地方官不知有多少!其实董主簿与张绳祖、王紫泥的关系,何尝不是官匪勾结,沆瀣一气,鱼肉百姓!书中借盛希瓊之口问道:“天下还得有个好官么!”这是愤激的话,也是官场普遍贪脏枉法无可救药的实情。试想在生养出和珅那等贪官的时空里,还会有多少官员能够“守廉”呢?

《歧路灯》还通过写“官二代”以写贪官。对于贪官,《歧路灯》虽然只是写了一个现任正式的地方官董守廉,但是还写了盛希瓊兄弟守着祖上所遗“四五十万家私”(第十五回)没有作财产来源的说明外,其他还写如夏逢若“他父亲也曾做过江南微员,好弄几个钱儿。那钱上的来历,未免与那阴鹭两个字些须

翻个脸儿”(第十八回),张绳祖说他“先祖蔚县、临汾两任宦囊是全全的”(第四十二回),甚至邓三变不过是一个卸任的驿丞,也变着法儿弄钱,这就明里暗里把官家老的少的、死的活的大都做成了一路,正呼应了“天下还得有个好官么”的愤言。

《歧路灯》中写有名有姓的贪官既少又小,并不是作者真心以为现实就是如此,而是其临文而惧,欲言又止。但在不指名道姓情况下的对官场腐败乱象的抨击与揭露则津津乐道,也绝不犹豫,毫不留情,较为突出的描写有以下三点:

第一,地方官克扣“工程项目”款。第八十一回“夏鼎画策鬻坟树”写夏鼎向谭绍闻报信:

夏鼎道:“现有一宗好消息,我对你说:咱祥符县奉文修衙门。本县在布政司衙门库中,领了好几千银子。出票子叫衙役在人家坟上号树,窑上号砖瓦,田地上号麻绳、号牛车。催木匠、泥水匠、土工小作,也出的有票子。那个衙役不发横财哩。”绍闻道:“他们发财,与咱们何干哩?”夏鼎道:“哎呀!他们发财,贤弟就要吃亏哩。”绍闻道:“吃什么亏?”……绍闻道:“这修理衙门,你不说在布政司库中领有帑项,难说不发与百姓物料钱、车价、工价么?”夏鼎道:“你还想价么?这修理衙署,也是上司大老爷,照看属员的法子。异日开销清册,砖瓦木料石灰价,泥木匠工价,桐油皮胶钱,小宗儿分注各行,合总儿共费了几千几百几十两,几钱几分几厘几毫几尘几沙,上司大老爷再检核一番,去了些须浮冒,归根儿是丝毫不亏百姓;究其实俱是苦百姓的。贤弟你如何知道儿,是这个做法?像这样做,才算是能员哩;这才克扣下钱,好奉上司,才能升转哩。”^{[2]782}

夏逢若就此为谭绍闻设计把坟树折价抵了曾揭的关帝庙银子,算是躲过了“修理衙署”的横征暴敛,但如祥符县官此种捞钱的手段,则应该是当时官场前后任相沿和上下彼此心照不宣的传统。

第二,官场潜规则。如官员趁各种年节庆典等名目收受礼品、礼金。第一七回写抚台谭绍衣为侄儿谭篔初主持婚娶,所属布、按、道等各级官员纷纷送礼,谭绍衣虽拒,但众官坚决不肯,谭绍衣只好收下分作娶资与陪妆。谭绍衣为表示清廉,自己确实没有收取礼物;但事实上他的宗侄及姻亲间接地因他享用了价值“五千有零”的贿赂。第三十七回又写官场中生存发展,全凭金钱拉关系:

张绳祖道:“……总是小家儿人家初发,还

不知这官场中椒料儿,全凭着声气相通,扯捞的官场中都有线索,才是做官的规矩。”^{[2]342}再如官僚相处,尤其请托做事,必须送礼,第五十一回写道:

邓三变笑道:“老朽既已勉允,不妨径直说明,好请二位放心。从来官场中尚质不尚文,先要一份重礼相敬,若有要事相恳,还要驾而上之些,才得作准。”^{[2]481}至于上官向下属索贿,则“夸夸就是要的”:

盛希侨道:“……像如今州县官想着要绅衿盐当商的古董玩器,以及花盆鱼缸东西,只用夸夸就是要的。司、道若叫州县办值钱的东西,一定要奉价,上头送来,下头奉回,说:‘这东西卑职理宜孝敬,何用大人赏价。’再一次不说,州县已知上台是此道中人,就下边奉去,上头用了。总之,上台要下僚的钱,或硬碰,或软捏,总是一个要。若遇见一个州县官心里没病,也就罢了。”^{[2]900}

而且行贿是见不得人的事,自然是暗中操作:

钱鹏送至门口,还嘱咐道:“公门中事,第一是要密言。”^{[2]55}

夏逢若道:“说你是个书呆子,你却会嫖赌,还会撞人命。好天爷呀!官场过付贿赂,最怕人知晓,……”^{[2]484}

第三,语言腐败。语言腐败是指“具有话语权的人出于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操纵人心。语言腐败的典型形式是冠恶行以美名,或冠善行以恶名”^[5]。学者一般认为这一概念是由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于1946年写成的著名小说《1984》中提出的,他在书中描写政府的四个部,“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和美术,和平部负责战争,仁爱部负责维持法律和秩序,富足部负责经济事务。”^[6]高度集权下,历史和语言都被改变。语言腐败现在已成为政治哲学理论中的经典术语。语言腐败的现象自古有之,但应该说,只是在20世纪之后,特别是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后,才变成社会公害”^[5]。其实,中国早在《歧路灯》创作的时代,语言腐败即已成风气,并成了社会公害。这突出体现于书中大量运用的“官场话”(第八十九回)、“官场套话”(第四十六回)、“官场中……通套”(第一六回)等。如吉语与避讳语:

况且做官的人,有两个好字,曰升,曰调,有两个不好字,曰革,曰故。这是官场的常

事。^{[2]820}

烟火匠道：“伺候官场的故事，第一宗是‘天下太平’，硫磺字，玉皇驾前长五丈、宽一丈一幅长条，上写四个碾盘大字‘天下太平’，第二宗是‘皇王有道’……”^{[2]970}

看来用这种大字标语以制造气氛的劳民伤财之法，古已有之。又如钱与官位之别称：

夏鼎指桌上爵秩本儿道：“我看看先君的缺，如今是那个做着的。那个缺就是好缺，官虽小，每年有‘一撇头’。”绍闻道：“什么是‘一撇头’？夏鼎道：“这是官场老爷们时兴吊坎话，一千是‘一撇头’。像这里大老爷，那时做布政使，每年讲一两‘方’哩。”^{[2]803}

盛希瑗……道：“即如今日做官的，动说某处是美缺，某处是丑缺，某处是明缺，某处是暗缺；不说冲、繁、疲、难，单讲美、丑、明、暗。一心是钱，天下还得有个好官么？……”^{[2]982}

以及行贿之别称：

程嵩淑道：“……帮之一字，乃是官场中一个送风气使钱的陋习。”^{[2]797}

总之，《歧路灯》虽然只是写“教子”“家政”等涉及到官场，官场既不是其描写的中心，作者也似乎顾虑重重，避重就轻，或力弗能及，从而并不曾深入写出官场黑暗的极致和制度与人性上的因由，但其有限的描写，仍是《歧路灯》题材内容上一个突出的存在，构成全书主题的又一价值层面。

三、书办吏役之恶

《歧路灯》叙事中，与其虽愤慨于“天下还得有个好官么！”，但写“好官”多而大，贪官小而少相反，另写有两类人是正大者少而作弊者多：一是“管家卖地，原是宦族恒规。人家仆人，求田问舍以及卖业弃产，俱是作弊的”（第八十三回）；二是“天下无论院司府道，州县佐贰，书办衙役，有一千人，就有九百九十个要钱作弊的”（第六十八回）。第九十回说祥符“这县衙书吏衙役，是他们喂熟的”。而所写这两类人中，又以写仆人作弊者少，书办衙役作弊者多。后者之多，几乎无非正在作弊和随时准备作弊者，是《歧路灯》中作者最深恶痛绝的一类形象。

《歧路灯》写书办衙役有名姓人物形象，最突出的是钱万里。第五回写他对来为谭孝移保举走门路的阎楷、王中说：“你问弟姓钱，名叫钱鹏，草号儿钱万里，各衙门打听，我从来是个实在办事的人。”后来他以五十两银子把谭孝移保举“连大院里，学院里，

都包揽了”，“办得水到渠成，刀过竹解”。乃至第一回谭绍闻等赴国子监肄业递呈等事，“俱是旧识钱万里包办，满相公跟随，酌给笔资”，证明了他确实是一个“要钱作弊”之上号吏中最不坏的人。中国自古皇权社会，百姓受官吏压榨习惯了，虽行贿办事非心所愿，但是比较花钱也办不成事来说，能遇上钱万里这种“实在办事的人”也就算幸运了。所以后来钱万里竟然成了谭家的座上客，待有了谭绍衣为靠山以后：

谭绍闻每日下学回来，后门上便有石灰字儿，写的“张绳祖叩喜”一行。又有“王紫泥拜”一行。又有“钱克绳拜贺”一行，下注“家父钱万里，字鹏九”。又有用土写的，被风吹落了，有字不成文，也不晓的是谁。^{[2]838}

俨然成了谭家的世交。

《歧路灯》写书办衙役之恶有具体描绘，但更多属于概括言之，综合而论约有以下几点：

其一，狐假虎威，仗势欺人。第七十九回“淡如菊仗官取羞”，写一个衙门的书办淡如菊在谭绍闻家与一班“老成典型”先生一起喝酒看戏，因为未被让坐居上席，觉得看低了他的身份，借说闲话为自己吹播：

少时，咽了几杯，问钱万里道：“钱师傅，这两日在衙门不曾？”钱万里道：“到明日就不是我该班了，昨日尉氏秦师傅已到，明日上班替我。”淡如菊道：“汝宁府上来不曾？”钱万里道：“他还是春天上了一回省，到如今总没来。昨十五日，号簿上登了他禀帖一叩。”淡如菊道：“他那西平县那宗事儿不小呀！”钱万里道：“什么事？”淡如菊道：“大着哩！西平有一宗大案，乃是强盗伤主事。西平是个青年进士初任官，且日子浅，诸事糊糊涂涂。内中强盗攀了一个良民，西平硬夹成了案。人家不依，告到府里。府太爷前日委敝东会审，我跟的去办。你说好不难为人，一个年轻的进士，咱如何肯不作养他？但他这读书的人，多是天昏地暗的，把事弄错，就错到一个不可动转地位。咱心里又舍不的闹掉了他这个官，想人家也是十年寒窗苦读，九载熬油，咱再不肯一笔下去闹坏。好不难为死人。”钱万里道：“休怪我说，那西平县是来不哩的人。六月上司来，投手本禀见，还要有话说，到官厅里坐下。那门包规礼，以及内茶房、内上号分子，跟他讨多少气。全不晓的做官的银子是‘天鹅肉’，大家要分个肥；就是不吃大块儿，也要撕一

条小肉丝儿。全不管俺是他一条大门限。难说本司一个大衙门，是他家堂楼当门么？”^{[2]766}

虽然淡如菊的自吹自擂被盛希侨当场羞辱，以致落荒而逃，但当盛希侨为办理谭绍闻、娄朴、盛希瓊赴国子监肄业“在祥符县递呈，申详学宪，知会抚台，办好部咨”时，仍“俱是旧识钱万里包办，满相公跟随，酌给笔资”（第一一回），不唯离不了这一类人，还少不了“酌给笔资”。

其二，上下其手，左右长官。上引淡如菊所言虽有嫌吹嘘，但是清代书办衙役对长官行政的影响虽因人而异，确实也不可低估。有时左右长官的施政乃至前程，也不是什么稀罕事。《红楼梦》第九十九回写“守官箴恶奴同破例”中，贾政就曾被手下作弄得无可奈何。至于《歧路灯》写衙役书办之害更甚，如第七回写谭孝移与柏公闲话：

这柏公因说起“当革的书办”，便触起三十年宿怨，说：“这京城各衙门书办，都是了不得的。我这小功名，就是他们弄大案蹭蹬了。一歇一歇儿细说。”^{[2]776}

他们甚至影响长官卸任交代能否顺利，第一六回写谭绍闻接任黄岩县令：

与前令交代。那前令是个积惯猾吏，看新令是个书愚初任，一凡经手钱粮仓库诸有亏欠之处，但糊涂牵拉，搭配找补，想着敷衍结局，图三两千金入囊。……争乃前令刻薄贪渔，向来得罪于一县之士民胥吏。这书办们，或是面禀，说某项欺瞒多少。或是帐稿，开某项折损若干。旧令便要锁拿书办，说他们舍旧媚新。这书办那里肯服。本来“三个将军抬不动一个理字”，旧令只得又认些须。支吾迁延，已将愈限，上宪催督新令具结。到无可再缓之时，旧令径过官署，面恳宽收，以全寅好。谭绍闻只得认了一半，草率结局。^{[2]987}

虽然这位“前令”也是有过在先，但此种时刻“书办们”居间予夺的作用也不可小觑，从而无论前令、新令都不免要留心提防。所以谭绍闻上任“作了一年官，只觉握印垂绶，没一样不是作难的，没一宗不是担心的。这宅门以内，笨的不中用，精的要哄官。想来想去，还是王象荃好，不如差人回祥符叫王象荃”。（第一六回）

书办衙役们更多是在日常行政中对长官上下其手。第六十五回《夏逢若床底漏咳，边明府当堂扑刑》写谭绍闻涉案，“将次受辱，适遇仓巷失火，边公不暇细讯，闪出一个空儿。早有刑房掌稿案的邢敏

行打算谭绍闻这宗肥钞，使人向王象荃说署中走线的话。王象荃道：‘宁可受应得罪名，衙署之内不敢用半文过付，以致罪上加罪。’”但是，谭绍闻的岳母巴氏心疼女婿，让侄子巴庚到刑房邢敏行处赶紧送了五十两银子，边公自府上回到县衙，与幕友赖芷溪、号件相公吴松庐、书启相公郑芝轩、教书先生蒋岚嶂“闲话”，说及谭绍闻涉案之事：

赖芷溪道：“明日上院回来，可把这一起赌犯叫在二堂审理，我们也看看这谭绍闻是怎样一个面孔。若果然有些书气，少不得仍要格外施仁，若是一板子打在身上，受过官刑，久后便把这个人的末路都坏了。”边公道：“也罢。就遵列位老先生所说，明日二堂审理。临时面夺。”……俱各从宽免枷，遂将此案完结。^{[2]628}

这一情节说主官边公与书办赖芷溪都非贪赃枉法，但是由于受了刑房邢敏行使转筒张二向赖芷溪等以“看那谭绍闻，面貌与按察司大老爷三公子面貌相似，将来必是个有出息的人”，打动了“幕友怜才之心”，进而影响了边公的判决，把谭绍闻轻责放了。这件事虽在边公与赖书办均无不正，但实质仍是“孔方兄运出万事亨通的本领”的结果。

其三，有关书办衙役之恶的议论。这是《歧路灯》中议论一大项内容，在一部书中随机生发，数量之多，言词之激烈，均可谓举世无双。如第五回写为谭孝移保举贤良方正：

阎相公也笑道：“端的怎个办法？这文书是要过那几道衙门？”潜斋屈指道：“学里，堂上，开封本府，东司里，学院里，抚台，这各衙门礼房书办，都要打点到。我也不知该费多少，总是五七十两银子，大约可以。你两个见景生情。”^{[2]51}

第七回写谭孝移收了一个长班张升，得知谭系保举贤良方正：

张升道：“这是礼部的事，将来还要到吏部哩。老爷天喜，小的伺候也是极有光彩的。只是要费钱，处处都是有规矩的，老爷必不可惜费。那是不用小的回明的话。”^{[2]67}

第一五回写谭绍闻以军功引见，也被“这不合例，那不合例刁难一个万死”，盛希瓊遂偷垫了二百四十两，塞到书办袖里。这正是上曾引及第六十八回则借盛希侨的管家老满所总结的：“天下无论院司府道，州县佐贰，书办衙役，有一千人，就有九百九十个要钱作弊的。”

这种风气漫延至私宅。第七回写一位退職官员柏公使用的一个老奴，不见门包就不给传帖，得了门

包就“啞的笑道：‘爷在厅院，跟我来，不怕狗咬’”。第一七回甚至还写了一位阴阳官奉谭抚台之命择嫁娶吉日，得了抚台“喜礼四两一个红封。到了上号房，号房定索传递劳金，阴阳官失备，逼令解封捏了一块，方放去讣”。显示无论什么人、什么事、以什么方式，“门包规礼”绝不可少。

其四，书办衙役办事要钱的原因。这固然源于人性的贪婪，但是也有制度上管理不严和某种程度不合理的原因，《歧路灯》中微有透露。第五回写钱书办向阎楷、王中讲过衙门办事步步要钱以后，附加了一句说：

只他们书办也苦，领的工食，只够文稿纸张，徒弟们的笔墨；上头也有部费，院里对房也有打点。难说宗宗文书，是有分赏的不成？^{[2]54}

由此可见，书办衙役之恶虽在人品，但其根本还是对这些人缺乏合理的管理制度，使他们的职业失去了公共服务的性质，成了养家糊口的直接来源，就难免不是“有一千人，就有九百九十个要钱作弊”了。此外，第七十九回借用李白的话道出幕府制度下官与吏“主”“客”关系的实质，以及幕友作为职业办事员“屁股决定脑袋”的现实情势。

四、“做官之法”

《歧路灯》写官场还值得注意的是其写“做官之法”。固然含蕴于具体描写中，但也有直接的申明，如第一四回写谭绍衣交待谭绍闻随任，把王中安排回家管事，说：

……那两个粗笨人，带在衙门里。要知道衙门内，用粗笨的最好。要说衙门中要精明的，天下有真聪明人而肯跟官的么？人做了官，便是人哄的人，越聪明越哄的很。你回监中去，托同堂诸生递一张随兄赴浙江藩署的呈字。要来清去明，虽小事亦当如此。那是国家太学，不管俗下如何看，我辈应当敬重。^{[2]968}

至第一五回“盛希瓊钱友赠良言”，又借盛希瓊向谭绍闻进言一大段陈辞，把李绿园“舟车海内……二十年”侍候官和做官的经验，主要是做知县的感悟，总结了一个大概，约可以分为以下几条：

一是“为人父母”的态度：“俗语说，知县是父母官。请想世上人的称呼，有称人以爷者，有称人以公者，有称人以伯叔者，有称人以弟兄者，从未闻有称人以爹娘者。独知县，则人称百姓之父母。第一句要紧话，为爹娘的馋极了，休吃儿女的肉，喝儿女的血。”

二是不能“一心是钱”：“即如今日做官的，……

一心是钱，天下还得有个好官么？……究之，身败名裂，一个大钱也落不住。即令落在手头，传之子孙，也不过徒供嫖赌之资，不能设想，如此家风可以出好子孙。到头只落得对子一副，说是‘须知天有眼，枉叫地无皮’，图什么哩？”

三是做官第一不可听信衙役：“……不可过信长随。衙役，大堂之长随；长随，宅门之衙役。他们吃冷燕窝碗底的海参，穿时样京靴，摹本元色缎子，除了帽子不像官，享用不亚于官，却甘垂手而立称爷爷，弯腰低头说话叫太太，他何所图？不过钱上取齐罢了。”

四是“这关防宅门一着不可等闲，要之也不中用。宅门以内滥赌，出了外边恶嫖。总不如你家王中做门上，自会没事。”

五是要请得好幕友，“第一等的是通《五经》、《四书》，熟二十一史，而又谙于律例，人品自会端正，文移自会清顺、畅晓，然着实是百不获一的。”

六是“衙门中，第一以不抹牌、不唱堂戏为高，先消了那一等俗气幕友半个厌气光景。还有一等人，理学嘴银钱心，贤弟尤宜察之。”

七是“审问官司，也要有一定的拿手，只以亲、义、序、别、信为经，以孝友、睦姻、任恤为纬，不拘什么户婚田产，再不会大错，也就再不得错。”^{[2]983}

盛希瓊最后总结说：“我虽不曾做官，我家母舅家，一位族间外祖，做过汾州府太守，常说他的做官之法，只六个字：‘三纲正，万方靖。’我之所赠，我之所送，尽此矣。”^{[2]983}

盛希瓊所言，其实是李绿园自己认为做官一任应秉持的操守，他自己在仕途中也有身体力行的实践。在小说中他借此做了直白宣讲，这也是他对书中官员言行的评判标杆。

此外，《歧路灯》还描绘了不少“好官”为政的手段，如上述周东宿“慎选举”聚众生员当厅公议、“荆八坐”一切案件“紧办速结”以杜绝作弊等，都是古代为官行政、执法断案的经验之谈。而第五十一回写董守廉查案验尸一节，细致详明，则是通俗小说中少见，而很可能是李绿园所身历者。

五、结 语

综上所述论，《歧路灯》“是中国古代小说独品一流之作”^[7]，围绕“教子”的主题写官场，既是“教子”主题的延伸，也是作者一生长期混迹官场，心感身受，有话要说的文学实践。李绿园受传统理学观念及清初实学思潮影响，“主张躬行实践，将道学的精

神贯穿于日常生活实践之中”^[8],除了强调文人在家庭的权威与责任,也涉及士人为官之道。虽然作者主意劝世,即劝为官的能做个“好官”,但是给读者的印象是官场的腐败堕落已如江河日下,无可挽回,已至于从这个官场传出的任何指望补偏救弊、洗心革面的话,都不再为人们所相信。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详细解释一个西方政治术语,说:“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9]这个典故是习近平总书记警戒基层官员要取信于民,提升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在此用来解释《歧路灯》欲表彰“清官”,但实际上读者却只看到“贪官”的南辕北辙现象,也颇为恰当。清中叶官场腐败,李绿园的救世之心正是遭遇了这样的“陷阱”。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歧路灯》中写了那么多的“好官”,却从来未能引起读者注意的原因了。

参考文献:

- [1] 杜贵晨.《歧路灯》主题百年研究述论[J].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19,34(1):120-127.
- [2] 李绿园.歧路灯[M].栾星,校注.郑州:中州书画社,1980.
- [3] 杜贵晨.《歧路灯》艺术百年研究述论[J].南都学坛,2018,38(6):36-52.
- [4] 杜贵晨.论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爱民主义”:《歧路灯》思想内涵别论[J].河北学刊,2013,33(1):92-98.
- [5] 张维迎.语言腐败的危害[N].经济观察报,2012-04-30(41).
- [6] 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M].孙仲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 [7] 杜贵晨.《歧路灯》定位百年研究述论[J].南都学坛,2019,39(2):39-45.
- [8] 李留文.李绿园的理学观探析:以《歧路灯》为中心[J].明清小说研究,2018(2):204-218.
- [9] 习近平.习近平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N/OL].(2015-09-08)[2019-05-10].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08/c_128206459.htm.

(责任编辑:唐志荣)